

## 敘述暴力與歷史

● 朱崇科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的著述《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以下簡稱《怪獸》，引用只註頁碼）的確引人注目，這當然不只是因為該書的論述對象——「文學與歷史的互動一向是我所專注的治學方向」（頁5）——是王的拿手好戲，可觀之處甚多，而且是因為這本論著可謂相當集中地薈萃了王論文書寫的秘訣及優點，發人深思之處比比

皆是。無論是不可踵武、銳利駭人的問題意識 (problematics)，還是其出神入化、招式怪異的文本細讀；無論是其縱論古今、橫跨地域的「文學地緣學」（這是指他游刃有餘地在不同國家或地域華文文學間穿梭、神遊，以及犀利的剖析和理論的獨特研究路向）實踐操作，還是其富麗妖嬈、張力激揚的文字，以及嫻熟的理論駕馭能力，都往往令人嘆為觀止。

《怪獸》共分四章。第一章「革命加戀愛」；第二章「歷史與怪獸」；第三章「詩人之死」；第四章「魂兮歸來」。表面上看來，《怪獸》顯得凌亂不堪、頭緒繁多，令人一頭霧水。實際上，在四章論述的各自為政間，我們隱然可以窺見王獨到和龐雜的書寫野心和視野、若即若離的曖昧又遙相呼應的主線貫穿——呈現文學「紀惡」（與現實關涉）的種種弔詭。

### 敏銳進路： 獨到的問題意識

考察歷史現實與文學的關係，某些頑固的現實主義者往往力圖將

王德威的《歷史與怪獸》引人注目，不只是因為論述「文學與歷史的互動」是王的拿手好戲，而且因為這本論著相當集中地表現出王論文書寫的秘訣及優點：銳利駭人的問題意識，招式怪異的文本細讀，縱論古今、橫跨地域的「文學地緣學」，以及嫻熟的理論駕馭能力——呈現文學「紀惡」的種種弔詭。

在王德威看來，聞捷的死是對毛澤東所倡導的身體政治的複雜性的背離與維護。他選擇自殺，可能蔑視了身體政治的權威，但自殺卻也同時加強了這種政治的崇高姿態，可以防堵歷史暴力。而朦朧詩人顧城之死其中的弔詭更是令人唏噓：一個後毛澤東時代的詩人，卻仍然做着封建時代和前毛時代一夫多妻的美夢，在難以實現的虛無中，死亡、惡與暴力其實已經注定。

作者的個人經歷與文學文本互相印證，力圖論證文學的「寫實」，這當然很多時候會陷入本質主義者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但是王德威卻轉而考察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是隱約的呼應，當然更可能是落差極大甚至勢不兩立。在此中，王德威呈現獨特的問題意識。

在「革命加戀愛」一章中，王獨特地發現了「革命加戀愛」此類陳詞濫調反映革命的代表性小說中的繁複姿態：於茅盾，他視這種書寫模式為「社會的病症」，但在書寫中卻呈現了弔詭——原本用來紀惡和暴露批判的書寫，卻也同時彰惡、助惡；而於蔣光慈則成了治病的良藥，不乏浪漫唯我論的極端；而於女作家白薇而言，則凸顯了女性的苦難與政治救贖的弔詭關聯，她恰恰是用「否定的敘事策略」在明知虛幻的情況下，不得不將錯就錯，將愛欲與政治捆綁。耐人尋味的是，在現實、寫實和虛構之間卻往往張力十足，屢屢再現現實的過於複雜、惡的迷幻寫實與小說的無奈純化。

在「歷史與怪獸」中，王則另闢蹊徑，考察敘事倫理中的延續與弔詭。陳國球指出：「王德威所思所慮，或者可以從兩處偵測：一是時間的穿梭；二是視像的形塑。這兩點甚而可說貫通全書的經脈。」（陳國球：〈形塑怪獸，招致鬼魂——讀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中國時報·開卷版》〔台灣〕，2004年12月12日）陳顯然指出了王德威獨特的系譜學操作以及對惡的不同形態的關注。但顯

然，王的思考不限於此，他想借反共小說《今禱机傳》的作者姜貴相對化、匿名化的敘事策略，指出現代中國革命（理想）中的暴力後果，同時王也看出了姜預言共產黨滅亡結尾的荒謬，他認為這個結論毋寧開啟了更多的疑問。晚清小說《禱机萃編》更指向了邪惡的機制所導致的惡幽深廣闊；晚明小說《禱机閒評》則弔詭地以瑣碎化以及人性化（日常化）的方式處理惡，提供了嶄新的寫實觀點。然而王德威的高明之處則往往在於再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機智，他最後總結道：「倘若歷史的功能之一在於紀錄而後戒除種種非理性之舉，那麼這些作家的批判之所以重要，非只為了他們分別形塑的怪獸面貌，而是暗示歷史本身已經變成一種幻滅的回憶形式：為了防止怪獸的重現，歷史總先一步的想像、記錄怪獸的形貌；如此，只要有歷史的存在，怪獸又怎麼能消失於無形？」（頁152-53）箇中對歷史與暴力的複雜依附關係看得相當透徹。

在「詩人之死」中，王更是相當敏銳和創造性地指出死的曖昧與弔詭：與暴力的糾纏、惡的牽連總是令人深思。在王看來，聞捷的死是對毛澤東所倡導的身體政治的複雜性的背離與維護。他選擇自殺，可能蔑視了身體政治的權威，但自殺卻也同時加強了這種政治的崇高姿態，可以防堵歷史暴力。施明正則更多體現了個體與政治壓迫的複雜抗爭以及對自我的維護，既懦弱又堅強。王更進一步指出，施「是以其隱晦的詩意／屍意，揶揄了政

## 「游刃」論證： 「小」「大」的出入策略

值得關注的還有王德威的論證策略。在其扎實、細膩和獨特的文本細讀基礎上，王德威其實表現出獨到的論證技巧，他別具一格的敘述和論證風格與思路甚至可以儼然演化為一種敘述的哲學。

1 論述考古學與系譜學。曾經翻譯福柯 (Michel Foucault, 或譯傅柯) 名作《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 的王非常清晰地貫徹和發展了這一啟人心智、發人深思的研究與論證策略。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王最具特色的論證策略之一。

王德威認為：「『考掘學』承認歷史事件和思想四散分離的本相，並進一步企圖探討期間的相互參差雜沓，卻又繫衍糾纏不息的關係」，而「『宗譜學』不再斤斤計較於理論性規則結構之分析，而轉求追溯某一人文社會現象的衍生過程、發展局限，以及制度化的條件，並藉此烘托出我們社會中『知識』、『權力』，及『身體』三者之間相互為用的複雜關係。」(見傅柯著，王德威翻譯、導讀：《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41、43) 回到王的具體論證上，我們不難發現王對上述策略的活學活用。

從其著述書寫的主線貫穿來看，其考察文學「紀惡」的弔詭中，卻是以相互並不直接關聯的四章從不同進路展開鋪陳則已經體現了王的考古功力——他並不着力於架設斷裂間的橋樑，而是更集中於其內在的糾纏。

治機器神的控制——他的身體，他的文學，和他的藝術都是他『自己』的」(頁205)。而朦朧詩人顧城之死則迥異於傳統浪漫論者視自殺為達到自我肯定的方式，「它並不肯定浪漫的主體性，而只以幽靈般的幻影重現了這一主體性的空洞。」(頁219) 而其中的弔詭更是令人唏噓：一個後毛澤東時代的詩人，卻仍然做着封建時代和前毛時代一夫多妻的美夢，在難以實現的虛無中，死亡、惡與暴力其實已經注定了。

王德威在「魂兮歸來」中的問題意識則主要體現為對文學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紀末)書寫鬼魅的獨特變遷：「書寫即招魂」，而「雄渾」傳統沒落後，二十世紀末的作家則更喜歡在歷史的廢墟上漫步，拼湊、重塑、遙指等等不一而足。

有心的讀者不難看出，王德威在挖掘文學「紀惡」的弔詭時，其實顯示了其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獨特進路，在其主線貫穿之下，往往對症下藥，令人眼花繚亂地呈現其(平凡之中)出人意料的切入視角。「革命加戀愛」體現了革命內在和外在外在的種種暴力與弔詭；「歷史與怪獸」從敘事策略角度呈現文學書寫歷史「紀惡」的延續弔詭；「詩人之死」考察了死亡與惡的複雜曖昧關係；「魂兮歸來」則開啟和縷述歷史迷魅中的暴力書寫遷移。同時須要指出的是，在這些章節之間，歷史的廢續意識若隱若現，王德威書寫的其實更是長長的文學「紀惡」的弔詭史，儘管其重心是落在二十世紀。

王德威在挖掘文學「紀惡」的弔詭時，其實顯示了其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獨特進路，在其主線貫穿之下，往往呈現其出人意料的切入視角。「革命加戀愛」體現了革命內在和外在外在的種種暴力與弔詭；「歷史與怪獸」從敘事策略角度呈現文學書寫歷史「紀惡」的延續弔詭；「詩人之死」考察了死亡與惡的複雜曖昧關係；「魂兮歸來」則開啟和縷述歷史迷魅中的暴力書寫遷移。

當一些學者利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新名詞裝腔作勢時，王德威卻選擇了化用。化用理論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斷章取義、膚淺借鑑的翻版。在「詩人之死」論述聞捷時，王德威就巧妙借鑑了福柯《性史》中的觀點，自殺被視為現代統治結構急速變動的重要指證：統治者操縱生死的辦法的轉型和權力機制的改變相輔相成。

更加引人注目的無疑是其系譜學操作。《怪獸》一書中幾乎所有的篇章都或多或少呈現了類似的敘述和論證策略。「革命加戀愛」固然如此，從1920年代到1930-40年代本身就隱含了不同時期革命小說敘事的譜系考察；而「歷史與怪獸」則顯然將其觸角伸向了晚明，赫然將明清文學的「紀惡」書寫與1950年代姜貴的反共小說神交，這當然也暗合了周作人對新文學源流（具體可參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的推證；而「詩人之死」似乎走得更遠，在時序之外，還加上了空間的想像與游移，在梳理二十世紀文學史上自殺的知名作家系譜基礎上，1960-1990的時序中的三位代表也清晰可見。

尤其值得一提的則是「魂兮歸來」，王德威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巧妙地融合了他所推崇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兩種理路和方法。其間，其雄心也再次呈現：他不僅將鬼魅敘述的古典高潮推至六朝，而且縷述了明清時代類似書寫的整體特徵。在此基礎上，他推出了現代以至當代文學中書寫傳統的延續、斷裂和嬗變。他甚至還指出這種潮流和書寫在得到西方志異小說和魔幻現實主義等洗禮之外，同時還不可避免地受到《聊齋志異》的影響，顯然，譜系的考掘清晰可見。

在空間上，王德威更是發揮了他一貫的特長，游刃有餘於兩岸四地和其他區域華文文學的脈絡中，他對類似作家「招魂」的差異與類似得心應手囊括手下，在在顯示

了「文學地緣學」的巨大優勢和超越性。

**2 化用理論。**當一些自以為是的學者利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新名詞裝腔作勢、裝神弄鬼，甚至成為可鄙的文化買辦洋洋得意時，當一些故弄玄虛的人借此斷章取義、削足適履時，當一些閉門造車的學者一聽到新理論就橫眉冷對時，王德威卻靜悄悄地選擇了化用。

化用理論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往往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斷章取義、膚淺借鑑的翻版，或者兜售術語、製造晦澀的「玄學家」。王德威在化用理論時往往能夠巧妙地利用某些理論的神髓，跳脫二元對立思維的限制。在我看來，在他的多數論著中，福柯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往往是他最直接或間接吸納的重要理論資源。

在《怪獸》中，王德威對理論的化用似乎更上一個台階。在洞悉諸多理論家有關暴力論述的基礎上，王德威卻在消化之餘另闢蹊徑，「從中國史學敘述的傳統中找尋可以借鏡的線索」（頁8）。

我們不妨試舉一例加以說明，在「詩人之死」論述聞捷時，王德威就巧妙借鑑了福柯《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中的觀點，自殺被視為現代統治結構急速變動的重要指證：統治者操縱生死的辦法的轉型和權力機制的改變相輔相成。福柯的觀點當然同樣可以挪移到1960年代的中國大陸政治體制。但是，王卻同時相當獨到地指出了特定現代政治機器的獨特，它施加權力的方式不僅靠「攫取」，也靠「培植」，藉

此生發開去，聞捷的死就成了對「崇高」美學的反叛，同時弔詭的維護和加強。

同時我們還須注意的是，王德威對二元對立的拆解。其中比較明顯的就是「小」「大」哲學的輪換和游轉。企圖對文學和歷史的關係作研究，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題目，陷阱重重，但王德威卻縮小口徑選擇了文學敘述歷史暴力的「紀惡」弔詭。當然，這同樣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王德威繼續以小見大，利用不同時段的幾部代表性文本以及與現實情景互動入手，考察不同主題之下的「紀惡」層次與弔詭。這樣一來，文學與歷史的複雜糾葛就成為文學文本與現實政治等的內在張力。反過來，從中又可以窺探王的野心和抱負。這種大小處理策略的確可圈可點。

## 他度可能

王德威非常清楚自己論述的缺憾和問題，也是一個非常自覺的書寫者。當然，如果我們持續逼問王德威在《怪獸》中所討論的諸多主題，從系統的嚴整性方面似乎仍然可以更進一步。畢竟單純選擇有限的數點進行論述，難免可能有遺珠之憾，如果能夠進行全方位普查，至少我們可以觀看更繁複的表演姿態。

在「革命加戀愛」一章中，白薇的個案對於茅盾和蔣光慈的另類對應，似乎顯得單薄了些，如果加上同樣書寫過革命加戀愛小說的著名

女作家丁玲（比如其作品《韋護》等），這個張力十足的個案想必可以讓革命加戀愛的其中的「紀惡」與暴力地圖更加可觀。當然，還可以錦上添花的是，茅盾自身的女性主義認知對革命的影響和互動似乎仍然可以持續開拓（比如陳建華在他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十、十一章就非常精闢地論述了茅盾此類小說「革命的女性化和女性的革命化」等等，值得借鑑），這樣或許可以比較出更多的意想不到來。當然，更多可能的個案如果成為鋪陳的背景，甚至是「紀惡」論述開展的網絡平台，這樣的系譜學建構想必顯得更加色彩斑斕、眾聲喧嘩。

「魂兮歸來」這一章其實蘊含了更多的可能性，王德威其實完全可以以此為基礎，搭建文學「紀惡」一招牌的二十世紀華文文學史。惜乎其中的論述在精悍之餘往往顯得過於濃縮。而且更多的文本分析和個案研究似乎也可以持續展開。比如在馬華文學語境之下，李永平在《吉陵春秋》中對吉陵圖像的勾畫活脫脫就是一部中國版的「惡托邦」（dystopian）再現。李永平的這部小說中，「惡托邦」則更多反映出半封閉的特點，扭曲人性的往往不是所謂的技術化、理性和科學化，而更多是非理性、蒙昧和欲望的暴力式宣泄等等（朱崇科：〈游移的「惡」托邦——論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旅行本土〉，未刊稿）。同樣值得重述的還有張貴興筆下熱帶雨林的「紀惡」、存惡的弔詭：原本同樣是

在《怪獸》的「革命加戀愛」一章中，白薇的個案對於茅盾和蔣光慈的另類對應，似乎顯得單薄了些，如果加上同樣書寫過革命加戀愛小說的著名女作家丁玲，這個張力十足的個案想必可以讓革命加戀愛的其中的「紀惡」與暴力地圖更加可觀。「魂兮歸來」一章中的論述在精悍之餘往往顯得過於濃縮，而且更多的文本分析和個案研究似乎也可以持續展開。

英殖民者統治犧牲品的華人卻弔詭的反過來奴役其他少數民族，而且更卓有成效。後殖民的弔詭往往如此不經意間赫然重現（朱崇科：〈雨林美學：重回歷史現場還是編織想像謊言？——從本土話語論張貴興的雨林書寫〉，未刊稿）。

當然，上述補充似乎都有事後諸葛亮之嫌，同樣值得警惕的是，

在講究論述的系統性之外，如何避免論述的冗長和重複似乎是另外一個擔憂。這不能不說是王德威深知的補充的另外一層弔詭吧。

但不管怎樣，在我看來，《怪獸》相當成功地薈萃了王德威數十年來治學的亮麗風格、方法、策略和清醒獨到理念，值得仔細閱讀和深入體會。

## 在啟蒙傳統中的新憲政論

### ● 蔣余浩

在中國行憲政有個重要的問題必須面對：經由移植而來的制度、理念和價值，如何與本土的政治、文化和傳統相契合？但中國的憲政運動從來都是現實主義的、「目的—手段」為導向的。國人從來沒有試圖把憲政法治當作一種價值融合進來。80年代以來，現代法治的工具性被強調得無以復加，價值層面的追問被棄之不顧。



季衛東：《憲政新論——全球化時代的法與社會變遷（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在對啟蒙的反思中，啟蒙運動以「傳統／現代」、「落後／進步」、「中國／西方」的二元圖式，為民主、自由與科學以及憲政、法治奠定合法性的根據，通過將空間上的區隔轉換成時間上的差別，使得啟蒙的話語成為普適的理念、可欲的目標。梅因 (Henry S. Maine)「從身